

伍



范培松
文集

范松松

文

范培松

文集

伍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培松文集. 第5卷 / 范培松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499-2224-6

I. ①范… II. ①范… III. ①范培松—文集②散文—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2401号

书 名 范培松文集(第五卷)

作 者 范培松

责任编辑 徐宗文 周敬芝

装帧设计 张金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电话 025-68037410)

厂 址 江苏南京市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4.25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2224-6

定 价 73.00元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短信 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658837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总 序

或许是缘分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花城出版社的徐巍专程来苏州组稿，准备出版一套丛书，约我写一本关于散文研究的论著。徐巍对我的信任，使我受宠若惊，因为在这之前我并没有多少散文评论面世。这是一种信任。环顾一下当今一些出版商的嘴脸，我更感到当时徐巍对我信任的难得。我喜欢散文，因为散文不会欺骗我，它的真性情容易使人亲近。在“文革”中被人折腾得死去活来的我，对世人的弯弯绕绕实在捉摸不透，一些自己尊敬的师长可亲的朋友可爱的学生，在这颠倒的岁月中变得令人恐怖。我开始研究散文，一方面是花城出版社促成，另一方面也是面对世事的困惑，被动地和散文亲近。总而言之，从八十年代初，我就和散文结缘了。

这是良缘，三十几年来，我天天泡在散文中，和它朝夕相伴，相依为命。

我的散文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散文创作论研究为主。当时我在高校担任写作教学，需要一些个案创作体验来支撑。借着花城出版社约稿的东风，我开始了对古今中外经典散文个案创作经验的研究。这是我的散文研究的初级阶段。我不是天才，只能老实地从阅读开始。这一阶段的研究，使我一方面对古今中外的经典散文作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培养了我个案上鉴别散文的能力。这种鉴别能力靠的是体验，靠的是感应，靠的是心与心的碰撞。钱锺书批评一些从事文艺批评的人是“太监”，常常接触宫女，却没有能力没有感觉。这话对我触动很大，“不当太监”，我时常用这句话提醒自己。当对一篇散文没有感觉时，就沉默。在评论中不敷衍不鬼混不人云亦云不胡捧乱吹。久而久之，熟能生巧，渐渐在散文上找到了感觉，而且在这一点上我极为自信。比如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根据我的体验，文章渗透了二元情综的矛盾和苦闷：他所倦怠的政治活动，不得不参加；而渴望向往的文学事业，又无法从事。所以他煞费苦心地找到了一个关键词——“历史的误

会”，以此作为文章的脊梁，从而形成如此的情感漩涡：历史的误会，把他放错位置——错位造成二元情综——二元情综又形成一连串的误会——误会的解脱出路：“回(家)去罢，回(家)去罢！”由此我也联想到《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来到大观园，最后她也感到这是一场误会，总有一种隔的感觉，临死前也喊着要回家，因为大观园不是她的家。这一比较，更使我对《多余的话》里的情感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体验。当然，这一体验也和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我当时担任系主任，这实在不是一个“官”，根本不能和瞿秋白相比，我能识别散文的情感的真伪，却不能辨别人们在我面前讲的话的真伪，许多人在我的面前把我捧得云里雾里，一转身恨不得要把我掐死。在这一点上，我和瞿秋白的心是相通的，所以我能找到这个切入口来评论《多余的话》。这一阶段的研究为我之后的散文理论批评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散文天地》、《散文写作教程》是这一阶段研究的结晶。这些努力使我可以不看他人脸色不随波逐流，并培养了我的基本功，尤其在散文上的鉴别能力，如果把散文分为经典散文、特色散文和大路货散文，我自信不会犯把大路货散文误认经典散文的错误。这样我真正取得了散文的研究权和话语权。同时对自己研究的散文对象也作了定位，我心中的散文必须具备这两大品格：一是“自己的”——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声音；二是“艺术的”——艺术品。

第二阶段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又是上苍给了我一个机会。1988年，当时的国家教委为了推动高校科研，首次决定在全国高校设立十个青年研究项目。全国从二百多个申报项目中，选出了十二个，我的《中国现代散文史》项目有幸被选中，但还要到北京大学答辩，从十二个中选出十个，淘汰两个。1988年11月，我冒着朔风，豪情满怀地北上，来到北京大学参加角逐。国家教委非常重视，聘请著名的学者蒋孔阳、袁行霈等专家组成评审组，对我们进行答辩评审。我慷慨陈述，滔滔答辩，我的《中国现代散文史》项目居然顺利通过，成为国家教委首批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但从此我也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以至不能自拔。其间曾出现过几次波折和险情，在大半部分书稿完成后，情绪出现波动，进退维谷，犹豫不决，正巧接到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赴港进行为期四个月的中外散文研究。正是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同行深情厚意鼓励下，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气势雄伟、景色秀丽的校园里，完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史》最后七万五千字的写作。在近三年时间，我阅读了近百位散文家的五百多本(篇)作品，看起来有些“笨”和“原始”，但这个“笨”和“原始”，使我在“跋语”中敢于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盼望着人们能超越它。但是

对于想超越它的人们我也要提出一点忠告：你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三阶段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在完成《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写作后，我就水到渠成地转入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研究，并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科研项目。实际上，这一阶段对于我来说，是散文研究进入了攻坚阶段。只要一进入散文研究，我就忘记了世间的烦恼。不管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难以撼动我的研究散文的决心和意志。在二十世纪散文批评研究中，尽管出现了众多的散文批评家，但是对散文批评的系统研究并且有丰硕成果的不多，大多是一些著名的散文家在创作之余的一些感悟，学术性不强。另外，对散文文类的归属和定位，分歧较大。我再次扎入原始文本中，梳理、集纳，最后形成了“三足鼎立——政治同化——多元蜕变”体系，完成了百年中国散文批评史的写作，填补了这一学术研究领域里的空白。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基础上，我前后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梳理中国二十世纪百年的散文创作，对各种散文流派和主要的散文作家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开始了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研究和撰写。这对于我来说，研究的视野和姿态又有了新的突变。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散文的创作热潮，以及之后的文化热，滋润和丰富了我的散文观。我深刻地认识到，散文是表现自我的文化性情和人性的艺术文本。我调整了自己的姿态，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以文化视角对百年散文史的审美进行评估，创建了“异军突起——裂变分化——消融聚合——和而不同”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的体系。这个体系，为学术界的许多学者认同，它的出版，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回首自己所走过的学术研究道路，有二十多年在编撰散文史。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内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从目前出版的各种文学史来看，基本上是以国家大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大背景来构筑体系，在叙述话语上，采取大叙事的方式。我想另辟蹊径，但是我的知识背景，以及我的经历所形成的学术研究的惯性，制约着我另辟蹊径。在漫长的编写散文史的道路上，我一直在和自己搏斗。我不想把自己所写的散文史的面孔，和那些标着什么什么“教材”的文学史糊在一起。为了摆脱这一惯性，我坚持阅读原著，文本第一，以自己的阅读原著体验来选散文史上的散文之“星”，尔后把选出的“星”，再放到国家大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中来考量，考量的重点放在审美上，以此构筑体系，这中间难以避免要有一些妥协，不妥协会使自己辛苦选出来的“星”，驳杂地混在一起。当然妥协要有原则，以不伤审美为度。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这样的坚持：在审美面前，散文作家人人平等；在审美面前，任何散

文作家和作品没有豁免权。在话语上,也尽量不用大叙述的方式。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对我的实践非常肯定,他曾这样评论说:“我把范培松同志的批评法概括为‘综合性体验批评’:即以历史的审美的批评为主干,吸收各种批评方法,再融会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感悟,推断出勇于创见的结论来。这种方法具有开放性和独特性,使这本著作具有一种多姿多彩、不拘一格的特色。”尽管我的散文史和散文批评史有一些妥协,但是我可以挺直脊梁说,它们发出了我的声音。我相信,读者阅读我的散文史书,能够感觉到我的呼吸,触摸到我的心跳。我的学术理想是,散文史应该是众“星”融在一起的美不胜收的“银河”,我为之作最大的努力。

散文评论必须充满活力。尽管我泡在“史”中,但仍关注着现实中的文学创作。我不喜欢四平八稳,也不喜欢滑头滑脑。我对博士生硕士生的评论要求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倾斜要有锋芒要有棱角要有个性。只要是认真研究产生的结论,我均支持,鼓励他们对作品有“偏爱”,对“偏见”、“偏论”我也非常重视。我坚持以开放的心态从事散文研究,也以开放的姿态培养自己的研究生。

在八十年代,我一手研究散文,一手研究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研究上,我特别要提到一件事,吉林文史出版社的社长左振坤,约我写一本关于报告文学的论著。1988年完成了《报告文学春秋》,交稿后,正遇“六四”风波,因为书稿中涉及到刘宾雁、苏晓康等,我担心书稿夭折。没有想到左振坤冒着风险,继续出版,并且不作任何改动。据说,就是因为这本书稿的出版,左振坤受到批判,并且被撤职。我心里为此极度不安,借这次文集出版之机,我在这里向这位正直的有骨头的出版家表示崇高敬意。

到了九十年代后,我一度中断了报告文学研究。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承担了送鲜花洒香水的责任,变得萎靡不堪,已到了死亡的边缘。对此敢不敢批评,开始我也有顾虑。那时评论界的风气又是如此甜蜜,我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会不会成为众矢之的?最后我还是站了出来,因为我要自己学生做到的必须我自己先做到。所以再次进入报告文学领域,写出了《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判退位》。文章的观点只有一个:“报告文学必须是批判的。”这也就是我的报告文学观的灵魂。文章一发表,《文艺报》立刻头版头条摘要转载。接着《文汇报》、《文学报》和《苏州日报》都发消息,摘要转载。发表此文的《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对我说,我们欢迎打官司,我们支持你。我从中得到了安慰,真正有理有据充满活力并能切中要害的评论,会得到读者的认同。但是,

报告文学的风气已经病入膏肓，一篇文章怎能扭转乾坤。现在文学垃圾多，报告文学垃圾尤其多。或许，当这些唱颂歌的甜蜜的报告文学家还健在的时候，人们就忘记了他们的作品。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坚持散文创作，在创作中体验散文的滋味。我从创作中尝到了甜头，因为有第一手体验，对评论的散文对象就能较为准确地看到它的优劣得失，使得评论能够中“的”。到目前为止，我已发表了一百余篇散文，第一本散文集《从姑苏到台北》已经出版。2009年，我开始了自己的前三十年的自传体散文《南溪水》的创作。之前，我曾经多次提笔想写自己的家史，但是一拿起笔，就感情不能自制，写不下去。这时我的女儿在一篇文章中，写了她的奶奶，即我的母亲，触发了我的强烈创作冲动，开始了对自己的前三十年的历史的叙写。历史记忆一直尘封着，一旦打开，我时时被感情的漩涡吞没，为我的家族和我的苦难而伏案痛哭，写不下去，断断续续整整写了一年，在2010年11月完成初稿后，分别给阎连科、孙绍振、苏叶、夏中义等传阅，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肯定和赞赏。在他们的鼓励下，经过2011年一年的修改，完成了这篇作品，以此告慰我在天的父母之灵。

因为自己长期兼任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家协会并不是一流作家的协会，各种层次的作家都集合在其中。因此一些青年作家或是拿出文集请我写“序”，或是请我对文集进行评论。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自己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我要真诚为他们鼓掌。对此我也认真阅读他们的文集，尽量实事求是地发掘其优点，中肯地指出不足，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以诚相待，不搞“嫩苗上驰马”。当然，个别的作者的文章还很粗糙，我就耐心地劝说。江西一位青年教师想出版一本散文集，寄给我，让我写“序”。我阅读了他的文集，中间较多篇章比较一般，同时了解到他家庭、经济困难，且是自费出书，就耐心说服他暂时不要出文集，在文章质量上功夫，将来再出书也不迟，他也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回首这二十多年的散文评论，我要特别感谢社会对我的关怀和支持。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在很多关键时刻，虔诚地帮助我，每次和他谈话，他身上的“仙”气，总能使我的心灵得到宗教般的净化。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上级，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总支书记邵玉彬，在“文革”中死里逃生，每次见面，总是问我的散文研究又有什么新作面世，他的真诚的期望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一次，他心脏病发作，刚从昏迷中抢救过来。我去看他。不知谁和他说，范培松牵了自己的宠物狗参加党的会议。他非常焦急。见到我，就虚弱地断断续续地说：

小范,你不能牵着狗去参加党的会议。尽管这是子虚乌有,但看到他的极虚弱的身体,我不愿让他再为我担忧,只是含泪点头,让他心安。现在他走了,我失去了一位永远呵护我的好师长。我会不断地用散文研究的新成果告慰他的在天之灵。1986年,当我散文研究刚刚取得了一些成绩,苏州大学的陈克潜校长大力提携青年教师,破格晋升我为教授,使我一段时间内,成为当时江苏省最年轻的教授。还有一些学者、作家,长期以来,和我相互搀扶,相互鼓励,同气相求,同声相和,称得上是道地的知己。当然,从事散文评论,一切的一切还要靠自己,唱了几十年的《国际歌》还要唱,世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既然我选择了散文研究,就得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为的是在散文评论的园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留下自己的印痕。

本文集共八卷,下面分别对各卷内容作具体说明。

第一卷、第二卷是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研究。收录《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分为上、下两卷,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1994年,我曾经出版了《中国现代散文史》,由于《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中吸收了它的主要内容,为避免重复,文集不再收入。文学是审美的,文学史是由经典的或有特色和影响的作家作品构成的、彰显和体现特定历史时代人的情感与精神渴求的文本体系。我主要的学术研究是从事散文史的书写,始终将重心放在作家作品的解读上,以一个个独立典型的作家作品为经脉的散文史叙述形式书写散文史。由于我把重心放在作家作品的解读上,我的独特的作家作品的解读体验,决定了我的散文史具有个性的色彩。

第三卷是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研究。收录《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第四卷是散文创作研究,收录《散文天地》、《散文瞭望角》和《散文写作十讲》。《散文天地》由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散文瞭望角》由台湾业强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次收录进文集作了一些删节。《散文写作十讲》由语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原名《散文写作教程》,因为它是根据我在苏州大学开设的“散文写作”课上的讲稿写成的,所以这次收入文集时改用了今名。这三本著作均是对散文写作技巧的总结和论述。因为它们是针对特定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在散文创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来写的,因此必须紧密联系他们的创作实践,学术性并不强。我在大学里曾经担任过写作教学,一直认为:要教学生写作,首先自己必须能写作,因此我坚持创作,尤其是散文创作的实践,以此体验写作的滋味,知道哪里要用力,关节点在何方,难点在哪里?这样我的散文写作技巧

的总结和论述,尽量能针对青年在散文写作中的苦恼和遇到的问题加以论述,尤其对散文创作的关节点和难点,花力气进行论述,决不放空炮,具有可操作性,努力为青年创作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尤其是《散文天地》和《散文写作十讲》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

第五卷是报告文学研究,收录报告文学论稿,辑录了我从2002年到2010年的报告文学论文,计四篇。这四篇论文,标志了我的报告文学研究的转折和飞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独领风骚,成为社会改革的报春鸟,人们怀着极大的敬意阅读报告文学,对它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但是后来报告文学的创作发展愈来愈令人失望,报告文学创作和研究同步实现了甜蜜化的蜕变,我只能把眼睛闭起来。但是,我的良心还是促使了我睁开眼睛,吆喝了几声。这四篇论文,就是我的吆喝之作,也是我的无奈之作。因为无奈,对它们特别珍爱。我要让世人知道,在甜蜜的报告文学的研究中,还有这样的一点刺耳的声音。它固然势单力薄,但是它毕竟是我自己的声音。由于对它们特别珍爱,所以这本文集破例没有以时间来排列,把这四篇论文放置到前面。《报告文学随谈》原由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由我和张晓林、张德明合著,其中《从报告文学的特点谈起》和《报告文学的采访艺术》是张德明所写,《报告文学作者的修养》是张晓林所写,其余均为我所写。《报告文学春秋》原由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另外,还收入了和叶葆华合作的关于报告文学写作研究一文。

第六卷和第七卷是文学论稿。其中第六卷辑录了我从1986年到2012年的文学评论,包括散文评论和文学评论两部分。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间破例收入了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章《告别上帝》。在我的散文研究中,对这篇文章我特别重视,并不是它有多么伟大,而是因为它是我的散文研究生涯中的姿态转折的标志。它写于1989年,时任《文汇月刊》编辑的刘绪源对我约稿,希望我能对杨朔、刘白羽和秦牧的散文进行评论。当时文坛上还是把这三位的散文奉若神明,他已经约过两位学人来写,都不满意。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写了这篇论文。寄给刘绪源后,不久,他来函,高度赞扬和肯定了这篇文章,并立刻发排了,把清样寄给了我。但是“六四”后,《文汇月刊》停刊了。刘绪源把这篇文章的样稿寄给我,让我留作纪念。这次编文集时,本想把刘对这篇文章的评价的信也收入,因为多次搬家,找不到他的原信,十分遗憾。刘绪源也是我的研究散文的知己,他钟情散文,尤其对周作人的散文有独特见解。我们相见,不需客套,可以直接对当今散文研究进行批判。快哉!

第七卷收录三部分文章。第一部分是文学鉴赏,包括诗词鉴赏、散文鉴赏

和儿童文学鉴赏;第二部分是序文总汇;第三部分是写作研究,中间收录了论著《悬念的技巧》,原由花城出版社1988年出版。

第八卷是散文创作。收录长篇散文《南溪水》,发表在《钟山》2012年第2期。这篇散文是对我的家族和亲人的倾诉,写的是我家和我前三十年的小历史。文中以童养媳、姐姐、嫂嫂、爸爸和妈妈之死,作为贯串全文的主线,他们每个人是一个历史时段的标识。我写这篇散文是当作历史来写的。对他们的悼念,也是对这段历史的悼念。本集同时收录散文集《从姑苏到台北》,原由台湾大地出版社2001年出版。同时又将历年来没有结集出版的散文以《行行重行行》、《与你有缘》、《烦恼丝》和《乡音》为名,收录进集内。本卷收六篇附录:一是孙绍振对我的散文研究的评论,他在散文研究领域里很有成就,正是这个原因,他深知我研究的艰难,于是对我颇多鼓励。他的鼓励一直在激励我前进。二是蔡江珍对我《南溪水》的评论。三是裴秋秋写我的特写。四是任宣平写我的特写。五是张颖整理的我的学术年表。六是评论和研究我的作品目录。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对我的著作予以评论的还有陈晓明、谢有顺、徐宗文、王光东、陈辽、王尧、丁晓原、王晖、范伟、徐国源、萧玉华、吴辉、文波、张立新、周玉宁、张宗刚、徐宁、石峤、陈小碧、丁佳蒙、毛乐耕等,借文集出版之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在我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我还主编和编辑了一些其他著作。有《写作教程》、《写作艺术示例》、《文学写作教程》、《散文的春天》、《师陀散文选集》、《汪曾祺散文选集》、《贾平凹散文选集》、《中外典故引用辞典》、《中国散文通典》、《古今不信神的故事》、《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四卷)、《苏州作家研究》(九卷)和《当代青春散文精选系列》等。其中有些著作还获得了奖励,如《师陀散文选集》获首届中国图书奖,《写作教程》获中国写作学会的优秀成果一等奖,《贾平凹散文选集》、《汪曾祺散文选集》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中国散文通典》获中国辞书二等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四卷)获江苏第九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对于以主编制的集体编写组形式进行研究和撰稿,我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等,都是学术性著作中的精品。但是当我参与主编后,才知道以主编制的集体编写组形式进行研究和撰稿,不一定能产生学术性著作的精品。一是参与的编写人员如果没有学术水平,或者有学术水平但是没有责任心,二是主编是个类似包工头的人,没有统领学术大局的本领,这些都会影响到著作的质量。所以我的体会,

尽量少参与以主编制的集体编写组形式进行研究和撰稿活动,不管是当主编,还是作一般编写人员,常常会吃力不讨好。主要原因很简单:不自由!

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一直是在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中挣扎着前进的。我是文革的幸存者,我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结构都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尤其在研究的起步阶段,我撰写的散文研究论文,不像现在那样讲究学术规范,是凭着自己对作品的心灵感应,向前摸索,就像“瞎子摸大象”那样,把自己摸到的“大象”的局部显现出来。因为这些“大象”的局部是我自己摸到的,所以尽管现在看来,是那样微不足道,我还是把它收进文集。散文研究一直是被人们遗忘的角落,我寄希望于明天。我相信,散文研究的明天一定是百花争妍!

获得自由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几起几落的人生历程,归根结底一句话:一切要靠自己。我生于草根,没有显赫的背景,唯有靠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没有作品的我,将什么都不是。我的八卷文集,记录了我的历程和印痕,也是中国转型时期的我的真实的存在。它是我的精神家园,里面种植的是我辛勤灌溉出来的各式各样的花草。

文集的出版,得到了省市有关领导梁勇、范小青、缪学为以及朱建华的关怀和支持,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顾华明,以及有关责任编辑对文集倾力支持,精心制作,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

夫人冯坤娣在我的治学道路上,一直自封为是我的“忠实的精神赞助商”。风雨五十年,不离不弃。在我最困难时,被造反派幽囚整整一年半,她独立挑起了抚养两个孩子的重任。这个温暖的后方,使我能全力以赴地进行散文研究。文集也凝聚了她的心血。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是文集的作者。

为文集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陈龙、何庆华、张颖、朱红梅、周国红以及宋桂友等,我也一并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和夫人在苏州相城



和小女儿在广州

范培松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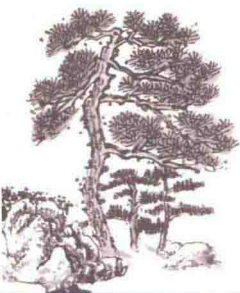
和博士生在苏州大学



2005年和大女儿在芬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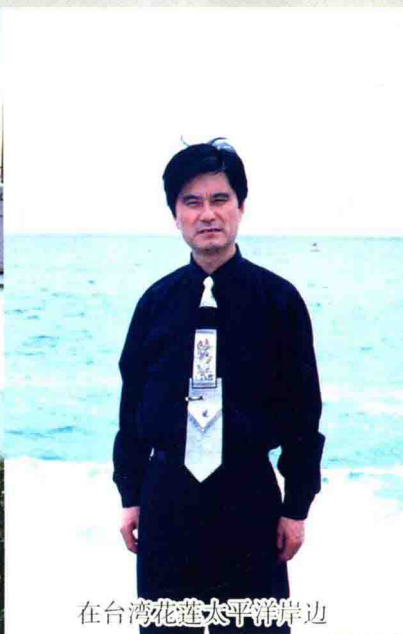
在台湾东吴大学和博士、
硕士研究生讲课后留影



和台湾郑明娟教授（中）、
李瑞腾教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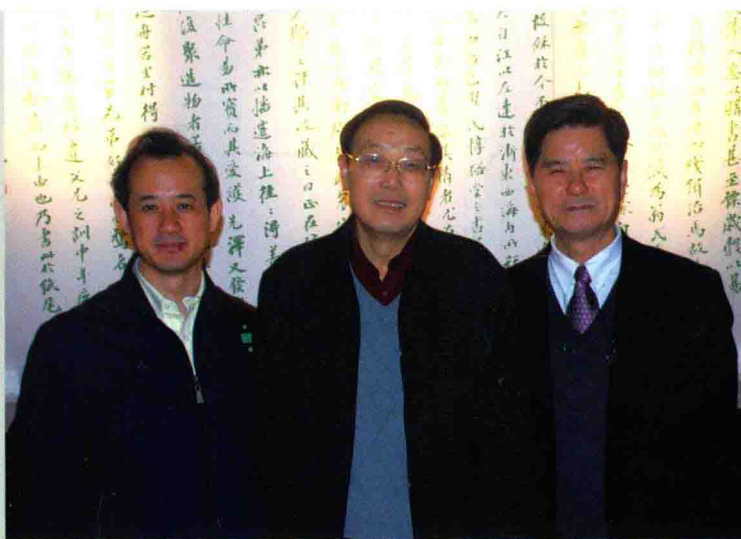


和陆文夫（左一）等人在一起



在台湾花蓮太平洋岸边

范培松文集



和李辉（左）、
王充闾（中）在一起



和贾平凹、周涛(中)在
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



在徐州市林荫大道上



和博士生在海南